

历史学

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

——近代知识界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之二*

郑大华

[摘要] “九·一八”后，随着“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潮的形成，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而“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人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已丧失殆尽，这也是造成中国落后挨打、民族日渐衰微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首先就必须重新树立和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在怎样重新树立和恢复民族自信力的问题上，就大多数人的观点来看，他们认为既不能夸大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辉煌，也不能将中国历史和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要认同和弘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优点外，还要尽力克服民族的劣根性或不好的方面。

[关键词] 民族复兴 民族自信力 近代知识界

[中图分类号] K264;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6) 01-0116-09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则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概而言之，清末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的孕育或萌发时期；五四前后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的初步发展时期；“九·一八”后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的时期，^①当时的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复兴思潮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更没有学者涉及到“九·一八”后知识界对于“民族自信心与民族复兴”的讨论。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 本文系 200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 (1931—1945) 民族复兴思潮研究” (09BZS033)、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研究” (13@zH018) 和 2013 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招标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006)。

^① 参见拙作：《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萌发》(《中国文化研究》2015 年第 1 期)、《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发展》(《安徽史学》2015 年第 2 期)、《论“九·一八”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史学月刊》2015 年第 6 期)。

“九·一八”后，推动知识界讨论“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的关键人物是张君勱。张君勱早年追随梁启超参加清末立宪运动，后因国民党迫害，于1929年去了德国，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一天，才回到北平。回到北平不久，张君勱即着手翻译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法国拿破仑军队占领德国时发表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之摘要本。在译稿前面的“引言”中张君勱写道：“数千年之历史中，大声疾呼于敌兵压境之际，胪举国民之受病处，而告以今后自救之法，如菲希德氏之《对德意志国民之演讲》，可谓人间正气之文字也。菲氏目的在提高德民族之自信心，文中多夸奖德人之语，吾侪外国人读之者，原不求必之一字一句之中，故取倭伊铿氏关于菲氏演讲之摘要本译之，繁重处虽删，而绝不影响于菲氏真面目……呜呼！菲氏之言，既已药亡国破家之德国而大收其效矣，吾国人诚有意于求苦口之良药，其在斯乎。”他认为费氏在演讲中阐述了民族复兴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在民族大受惩创之日，必须痛自检讨过失；第二，民族复兴，应以内心改造为重要途径；第三，发扬光大民族在历史上的成绩，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力。“此三原则者，亦即吾国家今后自救之方策也。世有爱国之同志乎！推广其意而移用于吾国，此则菲氏书之所译也。”^[1]1932年7月20日起译稿分5期（即从第1卷第3期到第7期）在《再生》杂志上连载，并于年底集结成书，由再生杂志社正式出版。《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演讲〉节本》出版后颇受人们欢迎，不久即销售一空。翌年春夏，又两次再版。

费希德《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的译介，促进了“九·一八”后知识界对“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的讨论。瞿世英在为张君勱译《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演讲〉节本》所写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现在所处的国难，可以说是历史上向来没有的。但我们回顾我们伟大的文化，灿烂的历史，想到我们坚韧劳苦的国民，想到四千年来为民族扩大进展努力的先民，为民族生存努力而牺牲生命的先烈，乃至在淞浦抵抗，在白山黑水间转战的国民所流的鲜血，我们应该激发我们的自爱心，自信心，自尊心，努力创造我们的前途。我们要痛自检点我们的过失，改造内心，提高民族的自信力。这是君勱翻译这本摘要的主旨。我希望凡读到这本译文的读者，在未读本文之先，先想一想现在的国难。读本文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民族的灿烂庄严的过去，自信我们有光明灿烂的前途。”^[2]张君勱在《欧美派日本派之外交政策与吾族立国大计》一文中指出：“国之立于大地者，必其国人自思曰：凡我之所能，为他人所不及；他人之所能者，我无一而不能，是为民族之自信力。英之所以有此国力，以其人民自信其航海通商与夫运用政治之技，为他国所不及焉；德之所以能仆而复兴者，菲希德氏尝言之，以其国民自信在具有原初性故焉；日人之所以连战连胜者，武士道精神实为之。虽各族各有特性，其政治军事文化之表现，因之而大异；然其为自信力则一。”也就是说，民族自信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兴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当时的中国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张君勱认为中国是惟外国马首是瞻，“他国有共产，吾从而共产焉；他国有法西斯，吾从而法西斯焉；不独政治为然，而外国学者之权威，亦高于国人一等……此媚外心之日强，即自信力之日弱。”他认为照此情形下去，中国是不可能建成独立富强的民族的，中国必须先有争胜之心，也就是先要有民族自信力，自信自己是优秀的民族，然后“政治乃能与人并驾”。^[3]天津《大公报》的“社评”提出，“今日欲救中国于危亡”，首先应该打倒那种认为中华民族除了“拱手待亡”没有其他出路的悲观消极心理，而大力“培养民族自信精神”，使全体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号为民族前驱之知识分子”，“不以艰危动其心，不以挫辱夺其气，共悬一鹄，努力迈进，要以复兴中国、光复故物为职志”。^[4]沈碧涛在《国人的危机》一文中强调，“自信力为民族最要之观念”，但自中西交通以来，因中国的一败再败，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受到沉重打击，这是“我们的最大的危机”之一。因此，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像费希特所讲的那样，从树立“自信力”做起。^[5]在吴其昌看来，我们“这个庞大的民族能不能复兴”，关键是要看“我们的自信力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我们“为不为”的问题，不是我们先天民族“有救”或“没有救”的问题，而是我们现代这些子孙“努力”或“不努力”的问题，只要我们像费希特所讲的那样，树立民族的自信力，相信中华民族既有灿烂的过

去，也会有光明的未来，那么中华民族就没有不复兴的道理。^[6]王造时指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哪个国家不经历过强弱，也没有哪个民族不经历过盛衰，但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转弱为强，有些民族可以转衰为盛，而有些国家或民族则终至被淘汰出局了呢？其关键的原因是要看该民族是否奋发有为，百折不挠地追求上进。“换言之，也就是要看该民族是否有自信力。有了自信力，亡可以复兴，弱可以转强，衰可以转盛，否则，只有开始于萎靡，沦落于奴隶，终至于消灭。”我们今日要打倒帝国主义，抵抗日本的侵略，实现民族复兴，“除了物质上的准备以外，须有精神上的振作，换言之，就是要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力。”^[7]雷震同样认为：“一个民族如果失去民族的自信力，没有民族的自觉心，所谓‘民心已死’，‘民气颓丧’，这个民族决不能生存于地球之上，古今中外，决没有这样民族能够存在的先例。”^[8]沈以定将民族自信力视为“复兴民族的三种必要力量”之一：“我们现在要复兴中华民族，第一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的脑海里深深地印下了一个民族的影像，使我们全国国民都具有一种——民族自信的力量——民族自信力。”因为，“对于被压迫民族，自信力是特别需要的，有了这种自信的力量，我们才有勇气奋斗向前进展，来复兴民族。”^[9]魏冀徵在《复兴民族方案刍议》中提出，“自信力是一切精神的基础，是一切活动的渊源，一切事业的成功，均以自信力有无为决定……故中华民族要求复兴，先要大家要有自信力，要是自信力崩溃，民族的命运，就立刻走上末路。”^[10]项致庄强调，“中国国民当前的急务是民族复兴，而复兴民族的先决条件，尤贵培养民族自信力。”^[11]梅力行也认为：“想复兴中国，我们目前最要紧的，是莫过于恢复中国民族的自信力。”^[12]

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是基于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的丧失而提出来的。谢耀霆认为，中华民族原本是最优秀的民族，曾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那时候“我民族自信力”是很强的，但晚清以来数次对外战争的失败，特别是抵抗八国联军侵华的失败，使“中华民族自信力丧失殆尽。从前仇外鄙外之心理，一变而为媚外与畏外；从前之完全自信者，今则完全信于人；从前之完全不信于人者，今则完全不信于己”。近数十年来，中国之所以人心错综，道德日坠，文化堕落，工商不振，国难踵至，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其“溯本追源，莫不由于不能自信所致，此诚中华民族落伍之最大原因，足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不知”。既然“中华民族衰落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失去了自信力的缘故。那么，我们要复兴中华民族，亦只有首先恢复自信力，然后始有复兴民族的可能”。^[13]杨兴高指出，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自古以来就以文明发达闻名于世，因此，中华民族向来为各民族所敬畏，所崇拜，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超越于世界各国之上，呼之曰天朝，尊之为上国。“当是时也，我国民众，无不以世界最文明最优秀之民族自居，怀有极高之自尊心与极大之自心力。”然而自鸦片战争开关以后，“中外形式为之大变，外侮之来，无力抵抗，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昔以天朝自命之中国，今乃下降而为任人宰割之次殖民地，世界资本主义者，无不以中国为其政治经济文化等之最好侵略对象物。”其结果，使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大受打击，中华民族从一个追求上进、自强不息的民族，“变为自甘暴弃，不思振作，毫无自信力与自尊心之萎靡民族矣。”^[14]而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的丧失，又使国家进一步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陈立夫强调，民族自信力的丧失，是由于受了“西化”或“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多数人不认识过去民族光荣的历史与光明的前程之故。不认识怎能生出信仰？不信仰怎能产生力量，自信力之消失乃是必然的结果。一个民族所以能够持续他的生命，必有他的恒久的光荣的历史作为推动的力量，有显著的光明的前程作为诱进的力量，使民族中个个份子对自己民族生存的绝对可能性与必要性都有深刻的自信，则对于民族的将来，自然负担起责任而无所期待，否则对于民族的过去，顿生疑虑，民族的将来，无所期许，自信力渐形衰微，凝结力因而疏懈，以致一旦遇到外侮，就没有法子可以抗御了。”^[15]所以民族自信力的丧失，是实现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复兴面临的重大问题。明仲恂把民族自信力的丧失归咎之于欧化教育。他在《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与恢复民族自信力》一文中写道：中国现代的教育太过欧化了，我们试看国内各学校的教材，多半是关于西方学术的介绍，对于本国固学的学术思想，反视同蔽菴，一般学生，若是与他论及外国文化历史，则高谈雄

辩，至于向他谈及本国文化历史，则好像在五里雾中，莫名其妙，这都是教育上偏于欧化的明证。这种教育，只会养成崇拜洋人的心理，只会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力渐渐丧失。^[16]和明仲恂一样，一位笔名叫“拜铁女士”的作者《这样如何能够恢复民族的自信心》中也把民族自信的丧失归之于小学教科书的崇洋媚外。她指出：“要求得中华民族复兴，必先恢复民族的自信心。这是牢不可破的铁则。”而“要恢复民族自信心，必须从小学教育着手。这是过去德意志已经证实了的事实”。然而中国的小学教科书中，充斥的是“外国人有能力，什么事都办得好，中国人不如他们，什么事都不容易办得好，打仗打不过人家，办事也不如人家，并且就是西洋好的东西，到中国也就变坏了”一类的内容。“这种观念，就其本质上看来，实在是现社会上流行的崇拜洋大人、畏惧洋大人的心理，无意之中搬运到教科书中里来。”在这种教科书的教育之下，国人又怎么能够树立起民族的自信心呢？^[17]在左翼学人潘梓年看来，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力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要使中国人大家都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具有优良的传统，具有良好的地理，丰美的物产，具有能够成为全世界优秀民族之一的力量，有他自己的特点，应该加以发挥；具有与其他民族竞胜的力量，不应自斫自弃。另一方面，自从甲午中东之战以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颇受斫伤，留学之风盛行一时之后，中国人就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家，就连西冷湖上的月亮也不及牛津桥畔的美丽，衣必洋服，食必西餐，宁请西医把病治死，不信中医中也有可用的。讲到文化，就只有希腊精神好，或者说必须全盘欧化；讲到民众力量，那义和团只是拳匪，民众武装只是土匪。总之，中国固有的东西，一切都是要不得的，这种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力的丧失，就形成了抗战前后“恐日病”的恶症，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危机。^[18]

二

既然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如此的重要，那么，怎样才能重新树立或恢复国人对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呢？张君劢认为，要重新树立或恢复国人对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首先必须尊重和表彰本国的历史和文化，“岂有一国人民不尊重自己文化而可以立国的”？据此，他对当时思想界出现的那种数典忘祖，“视吾国所固有者皆陈规朽败”，全盘否认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19]笔名叫“子固”的作者强调，“要建立一个民族的信心，决不能从骂我们的祖宗中得来的！我们必须用过去的文化伟绩、人格典型来鼓励我们向前，来领导我们奋斗。”“我们应该纪念我们祖宗五千年来为我们民族屡次奋斗的艰难，我们应该发扬我们祖宗创造的文化的优点，从这种心理当中我们才能得到民族信心，得到勇气来破除目前的难关！”^[20]谢耀霖与张君劢、“子固”的观点一致，认为“恢复自信力，亦为复兴民族之首要条件”，而要恢复国民的自信力，惟有努力去表彰、去发扬“中华民族过去的光荣与伟大”才有可能。具体而言，他主张要在全中国学校尤其是小学中增加历史课程，要把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岳飞、诸葛亮、汉光武、明太祖的事迹灌输到青年人的头脑中去，使他们能“在历史上去认识中华民族的伟大”，从而树立起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决没有不是最高的自信心所驱使，而为祖国民族历史上的光荣而发挥底。”^[21]陈立夫指出，要复兴民族，必先恢复民族的自信力。而“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必先检讨中国固有的文化以认识民族光荣的过去”。^[22]一位名叫“华生”的作者也认识到了历史教育对重树国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的重要作用，提出“我们需要有适当的历史教育”，使国民对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文化有一全面系统的了解，“以恢复民族的自信力”。^[23]如前所述，明仲恂和“拜铁女士”认为，国人民族自信的丧失，是由于我们教育过于欧化、其教材充斥的都是崇洋媚外的内容，因此，我们要保存固有文化，恢复民族自信力，其方法只有从教育入手。“如果教育当局能认识固有文化的优点，在教材上注意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探讨，使一般学生对固有文化发生爱慕的感情，并且加以深刻的研究，则民族自信力，自然可以挽回，民族复兴运动，才可迅速的完成。”^[24]

与张君劢等人不同，胡适认为，民族自信力虽然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但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立的基业不完全是光荣”的。所以，民族自信力“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而只能“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

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地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他“反省”的结果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不谈，因为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就是我们能与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的周秦时代，仅就文学、雕刻、科学、政治这四项而言，我们也要比希腊罗马的文化贫乏得多，尤其是造形美术与算学这两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显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就此，他强调指出，那种建立在肯定和尊重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自信心是“无根据的自信心”，“是建筑在散沙上面”的自信心，根本“禁不起风吹草动，就会倒塌下来的”。“信心是我们需要的，但无根据的信心是没有力量的”。^[25] 梁实秋的观点与胡适相类似，认为“振起民族自信力的方法，不是回忆已往的光荣，而应该是目前做出一点惊人的成绩来。我们现在不怕缺乏自信力，怕的是在事实上做不出足以启人自信的成绩。如果要表现民族自信力，我们不要用宣言的方式来表现，要在事实上来表现”。^[26] 一位名叫曹汉奇的南开大学学生也反对靠“翻家谱找祖宗”来恢复民族自信力的做法。他在《如何能恢复民族的自信心》一文中写道：“说中国人民失了自信心，我信。说我们应该恢复自信心，我也信。说恢复自信心就得翻家谱找祖宗，我不敢轻信，因为日本并不是找祖宗才座 [坐] 上第一流交椅，土耳其也不是翻家谱便达到了独立！”实际上，80年前亦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我们不都是天子骄子，别人不都是夷狄吗？自信心之大，不谓绝后，可称空前。但是中国民族除了周秦诸子在哲学上，在征服自然上可有什么贡献？鸦片战失败，甲午战又失败，庚子战再失败，我们的自信心不还是很大么？张之洞一类的人，仍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仍说是向地下吐痰就是中国文化！但是这自信力，不但没有救我们，反而使我们的自信心终于不敢自信了！由此可见，“盲目的、枉自尊大的自信心，不但不强而且还可害国。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的一段历史很足给我们作很好证明。由中国的皇帝到叶名琛一类的大臣学士的自信心都不算小，但是一与外国人相碰就不得不他信了。所以我说要想使民族复兴起来，不是提倡空的自信，说几句大话，捧捧圣人，喊一段演讲，人民就会自信。而是必须另做一种使人民不能不自信的工作了。”^[27] 胡礼殷同样不赞成那种认为“要恢复民族自信力，便要自信悠久的历史 and 固有的文化可以复兴民族”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华悠久的历史和固有的文化，的确可以证明中华民族的优秀，减少对自身的失望，但是我们与其相信过去，毋宁相信过去和将来，与其自信中华民族趋于没落，古代胜于今代，毋宁相信今代胜于古代，中华民族究竟还在进步，而且将来更可以进步。回忆壮年的幸运，是老境凄凉中的慰藉，年少气盛的人便只知努力前程；称道祖功父德，只是破落户子弟的无聊消遣，兴家立失的人便无需于此。中华民族如果仅有壮年的幸运或祖功父德可以夸耀，那么也只好自遣自慰，但事实上中国2000年来是在不断的进步中，虽然远不及欧美日本进步得快，但决不是全无进步之可言，近数十年的进步，尤其有相当的迅速。“这些有限的进步，虽不足满足我们的要求，适应时代的需要，但可以证明中华民族不是不能进步的民族，中国的前途决不是没有进步之可言，我们如果对于中国的进步和前途的希望失掉自信力，复兴民族的将来，倒是非常危险的。”^[28] 上海《大公报》的“社论”则强调了“自信心”与“夸大或虚骄”的区别，指出：“所谓民族自信心，并不是民族的夸大或虚骄。夸大虚骄是懦夫遮盖其弱点的表现。因为自己本身不行，自己才要把祖宗搬出来替自己撑门面；自己本来是胆怯，才要说大话以表示个人的勇敢。这是一种逃避事实的心理，是极没出息而且极无聊的心理。自信心却不如此。有自信心的人就是不否认事实的人。自己知道自己的短处，而自己却不护短；知道自己弱点，而却想办法来补救它。军械不如人是事实，科学不如人也是事实，但是我们绝不甘于终久的落伍。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终有如人之一日。”^[29]

究竟怎样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呢？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独立评论》为主要阵地，

知识界展开过不算太热烈的讨论。胡适提出，我们在建立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时要有反省的意识，“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到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导我们向上的。”“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替祖宗消除罪孽，替子孙建立文明，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30] 胡适的观点除得到周作人、梁实秋等少数几个人的支持外，^[31] 绝大多数人则提出了批评。吴其玉指出，胡适提出的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应该建筑在反省的基础之上，这是正确的，但“反省也应该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劣优并提”，既要“看人家的长，我们的短，更应当知道我们的长，人家的短”。比如，“我们的瓷器、丝织品、刺绣、建筑、文学以及哲学，虽并不光辉万丈，究没有什么羞辱中国文化的。并且这其中外来的成份虽然不少，而大半也正足表示中华民族是有改进与创造精神的……我们黄帝造舟车、造文字、造丝、造屋子的时期不和同时期的欧洲——草昧未开的欧洲来比呢？这样一比我们与欧洲人不是半近八两，差不了许多了么？”因此，他认为，那种“过夸中国的文化、过夸中国人的创造力”的观点“固然不对”，但像胡适那样把西方文化“提得过高”、把中国文化“压得太低”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相信不如人，或‘知耻’虽然可以作为努力有原动力，可是过分的自愧，也有流弊的，也会造成民族自暴、自弃的心理，造成他对于其他民族屈服卑鄙的心理。结果是可以亡种、亡国的。”^[32] “子固”也指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美点与丑点”，我们不能由于过去有一些诸如骈文、律诗、八股之类的丑点，而否定我们整个的民族文化。否则，就像“一个不肖子因为他的母亲脸上有过几粒麻点而说她是世间顶丑的女人一样地不合道理”。我们不能因有小脚、八股一类不好的东西，而将“我们民族文化孕育产生的孔孟壮墨秦皇汉武李白杜甫岳飞朱元璋以及数不清的圣贤天才……一概抹杀”。^[33] 还有批评者认为，对于中国的固有文化既不能过于“捧”，也不能不加限制地“抑”，“‘捧’狠了误事，‘抑’狠了亦是误事的”。^[34]

《独立评论》上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复兴月刊》发文指出，我们既不能一味地“夸耀其过去的光荣”，也不能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如果说前者的心理是“妄自夸大”的话，那么后者的心理则是“妄自菲薄”，而无论“妄自夸大”还是“妄自菲薄”，都不是对待历史文化的正确心理。^[35] 《宪兵杂志》第3卷第3期的“卷头语”写道：有人以为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和欧美比较起来，不知相差了几世纪，一辈子也赶不上他们的程度。这便是缺乏自信力。其弊是自暴自弃。同时也有人迷恋着历史上的光荣，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哪一件不是我们发明的？所以他认定欧美的文化远不及我们的“国粹”。这是自信力？不，这是夸大狂，其弊是虚骄自满。自暴自弃和虚骄自满的民族是不会有好的前途的。^[36] 《民力周刊》第1卷第7期的一篇文章也指出：我们要恢复民族自信力，就既不能像闭关自守时代的民族自高自大；也不能像全盘欧化者之“西方人优于东方人”的自馁自叹。前者是过于乐观，轻视他人；后者是过于悲观，看轻自己。轻视他人，则样样自满自足，难于求得进步。轻视自己，则事事志馁气短，毫无生气。这两种心理，都是要不得的，对恢复民族自信力有百害而无一利。^[37] 即便是胡适，通过辩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固有文化”是有可以颂扬的地方的，至少“有三点是在世界上占数一数二的地位的”，这就是“最简易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会构造，薄弱的宗教心”。^[38]

三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尊重本国历史和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对本民族和文化之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的反省意识。解炳如撰文指出：“自历史上观之，凡一民族在极为难的周遭中，必有一种深刻而沉痛的反省，进而又努力挣扎向上的态度与民族复兴的冀求。”他认为，中华民族既有许多优良的民族品格，如勤劳、忍耐、节俭、实际性等，这些优良品格当然要保守并发扬光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也有一些劣根性。概言之，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利己；二虚伪；三文弱。这些劣根性是造成“国家不振”、“社会堕落”和“民族萎靡”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日国难严森，

民族危急之时”，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则“舍民族性的改造”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也就是说，“复兴民族从任何方面着手，均须以改造民族的劣根性为依归，则民族复兴始有希望”。故此，他大声疾呼：“要想中华民族有出路，须铲除‘利己’的劣根性！”“想要中华民族存于天地间，须铲除‘虚伪’的劣根性！”“要想中华民族复兴，须铲除‘文弱’的劣根性！”^[39]江问渔也认为，中国的文化历经四五千年而不坠，这必有它的优点在，但近代以来之所以落伍，这肯定又有它的不好方面，这好与不好都与中国的民族性有关。在他看来，中国的民族性主要表面在五个方面：“第一、能适应环境，而不能征服环境。”由于能适应环境，所以中华民族无论居于何处，都能使子孙后代绵延不绝，兴旺发达，但当历史进入近代后，科学日新月异，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突飞猛进，物质文明丰富发达，而中国因科学落后、征服自然能力差，而“不能完全创造现代的文明，与欧美人相较，遂不免处于劣败的地位”。“第二、善于保守，而不善于进取。”保守并不一定全是坏事，但如果“应保守而不保守，应进取而不进取，那就很坏了”。而就保守与进取比较，对一个民族和文化的发展来说，“进取的精神更重于保守”。中国人因缺乏进取性，所以不免到处吃亏，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善于摹仿，而不善于创造。”中国文化经历过三个发展时期，即秦汉以前一个时期，秦汉到清代一个时期，清以后到现在一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只有第一个时期是“文化的创造时期”，而也只有那个时期的文化最灿烂辉煌，此后不仅中国人“创造的能力渐渐消失，就是摹仿的能力也差得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哪有不落后的道理！“第四、洁身自好，而缺乏侠义的精神”。洁身自好，本来是一种好的品质，但如果超过了度，就把见义勇为的精神失掉了。中国人现在就是如此。这虽然和“国家政体、有力学说皆有关系”，但也是汉代以后中国的侠义精神逐渐消失殆尽的结果。侠义精神的缺失，“这在民族精神上，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损失。”“第五、安分守己，而没有团体生活的习惯。”现代文化的要素，一是科学，一是集团。而中国人独善其身则有余，团体生活则不足，团结的力量差得好，“因此，中国人便成一个无组织的民族，遇事皆受人家的压迫，吃人家大亏。”基于对中国民族性的上述认识，他认为我们要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就应“把固有文化加以整理”，民族性中不好的方面，“应设法除去”；好的方面，“应设法扩充”，这样民族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40]

要实现民族复兴，除了张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优点外，还要尽力去克服民族的劣根性或民族性的不好方面，否则，这些劣根性或民族性的不好方面会制约民族复兴的历程，影响民族复兴的实现，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少学人的基本共识。赖希如就明确提出，要实现民族和文化复兴，就需要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弱点”进行改造。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弱点”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观察：一是从活动力及发展力方面观察。中国的民族风尚，向来尊崇道德，而蔑视才艺，以守分安命、顺天听命为极则。“此种崇尚宁静无为，苟安天命之结果，于不知不觉中，遂逐渐养成安闲自适民族堕性，而听天由命之宿命论，亦则是而深入人民之意识中”。二是从组织力及经营力方面观察。中华民族向来崇尚那种无拘无束之飞鸟式自由，“缺乏秩序之观念，复无纪律之规范”，西方人视中国人为一盘散沙。“人民本身之组织如是，其他对于事业之经营，亦正同出一理”，中国人不擅于经济上的经营和竞争。三是从吸收力和理解力方面观察。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有两种消极元素，“一为唯我独尊，蔑视一切之‘排他性’；一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保守性’，所以中国不善于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对外来文化往往不求甚解，厌于讨论求详”。四是从伦理道德之消极倾向方面观察。中国的伦理道德，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消极的一面而言，如“自私自利”，“人人但知有家庭，而不知有所谓社会。知有家族，而不知有所谓民族；家虽齐，而国不治。”五是从务虚名而轻实际方面观察。中国人比较尚虚名，重形式，爱好体面，如“吾国社会婚寿丧祭之礼仪，其形式之繁重，殆为世界各国之所无”。总之，赖希如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非常复杂，有“优点美点”，也有“弱点劣点”，对于前者，“吾人应使之充分发挥”；对于后者，“尤应逐渐加以改造，以自求适应现代之生存”。而改造的“唯一工具”，他认为是“国家之教育与文化”，也就是首先要对国人进行“求知”的教育，国人有了“知识”就会产生“权力”观念，

“有此权力，便能自己‘实行改造’，最后而达于‘至善’之境。”^[41] 笔名为“立名”的作者认为，中华民族曾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这是中华民族“可夸的价值”。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所存在的过度保守与信仰浓厚之二性格”，虽然在历史上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身是含着非合理的成分的。过度的保守与浓厚的信仰之充分的现实，在其反而招来民族发展的障碍，这便是使中国民族不能在近代史上继续对世界史贡献其原始的使命的原因。”另外，中国之所以从以前的世界先进国家而“退潮，以至于走入危机的局势”，其原因不外五点：“（1）由创造的崇拜文化转为追随的崇拜文化，不得不由跃进的世界文化退潮；（2）爱好和平走入至极，不得不由竞争的世界人群中落伍；（3）恪守正义而蔑视时间性与空间性，不得不遭受强暴的世界人群的践踏；（4）重视感情过度，招来内部无组织之危机，不得不遭受世界强力的压迫；（5）无恒心的崛起，必然敷衍主义弥漫，其此而生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意识，蚕食了民族的发展力，不得不使民族势力趋于衰微，民族危机濒于落暮。”既然以上种种是导致“中国民族落后的基因”，那么，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要图民族重新抬头再向世界史上积极作种种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必须先对上述国民性中“国度保守与信仰浓厚之二性格”进行改造，使之实现“最合理的转换”，即：“（1）保守性的扬弃，进取性的增长；（2）迷信偶像崇拜的扑灭，新民族意识形态的树立。”在此基础上，“更进而促使上述诸性格之不合理的转换再作新的转换，以达到最美善的境域”。^[42] 萧一山认为，“懦弱，自私，愚昧，这是中华民族现在每个人所具有的缺点，其来源是由于无武力，无组织，无学术而产生的”，如果“我们不能克除这些缺点”，我们就不可能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现代国家”，也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怎样才能“克除这些缺点”呢？“其道有三：尚武——恢复生存必要的抵抗力；组织——加强团结一致的精神；科学——‘迎头赶上’欧美文化。”因为，“尚武”需有组织的力量和科学的供给，不是光凭“匹夫之勇”和“血肉之躯”；“组织”需要有尚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不是光凭“形式制度”和“老套文章”；“科学”需要有尚武的通气和组织的运用，不是光凭“飞机大炮”和“乌合之众”。抗战以来，国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尚武”、“组织”、“科学”的重要性，但“怯懦”、“自私”、“愚昧”的“病根还未拔除净尽”，要彻底拔除这些病根，就需要“敌人的炮火来摧毁、扫荡，民族的自觉来开拓、启发，教育的力量来改造、培植”。只要拔除了“怯懦”、“自私”、“愚昧”的“病根”，建立起“尚武的精神，团结的意志，科学的文化”，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民族复兴，犹反掌耳”。^[43] 潘梓年一再强调，所谓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与“自傲自大没有丝毫相同之处。自傲自大的人只相信自己一个或自己身边的少数几个人，而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不仅相信自己，同时也相信别人，相信全民族的同胞都或多或少具有抗战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不但要尊重自己，同时也尊重全民族的同胞都是中华民族儿女，同样有着不可侵犯的人格和要权。“所以民族自尊心 and 自信心，就是尊重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史与文化，相信在这个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下，中华民族的全数儿女都有自力更生的巨力，就是重视民众、相信民众的力量。”^[44]

民族自信力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认同和对美好未来的坚信，它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力量之源和精神支柱。有感于近代以来民族自信力的丧失，“九·一八”后的中国知识界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必须树立或恢复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并就如何树立和恢复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进行了讨论，就大多数人的观点来看，他们认为既不能夸大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辉煌，也不能将中国历史和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前者是虚骄自满，后者是自暴自弃，虚骄自满和自暴自弃都不是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正确态度，也无助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的恢复或树立。他们尤其是在尊重本国历史和文化的同时，又能对民族和文化的阴暗面持一种揭露和批判的反省意识，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要认同和弘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优点外，还要尽力克服民族的劣根性或不好的方面，否则，这些劣根性或不好的方面会制约民族复兴的历程，影响民族复兴的实现。上述这些观点，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就是现在看来，仍然有它借鉴的历史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吸取。

[参考文献]

- [1] 张君勱:《菲希特〈对德意志国民演讲〉摘要》,《再生》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20日。
- [2] 瞿菊农:《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演讲节本〉序》,《再生》第1卷第7期,1932年11月20日。
- [3] 张君勱:《欧美派日本派之外交政策与吾族立国大计》,《再生》第2卷第1期,1933年10月1日。
- [4] 《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天津《大公报》1934年5月15日“社评”第3版。
- [5] 沈碧涛:《国人的危机》,《大公报》1931年11月3日“读者论坛”第5版。
- [6] 吴其昌:《民族复兴的自信力》,《国闻周报》第13卷第39期,1936年10月5日。
- [7] 王造时:《恢复民族的自信力》,《自由言论》半月刊第1卷第17期,1933年。
- [8] 雷震:《救国应先恢复民族精神》,《时代公论》第29号,1932年10月14日。
- [9] 沈以定:《复兴民族的三种必要力量——青年应负民族复兴之责》,《浙江青年》第2卷第7期,1936年。
- [10] 魏冀微:《复兴民族方案刍议》,《苏衡月刊》第1卷第6期,1935年。
- [11] 项致庄:《培养民族自信力为国民当前之急务》,《江苏保安季刊》第4卷第1期,1937年。
- [12][37] 梅力行:《如何恢复民族的自信力》,《民力周刊》第1卷第7期,1939年。
- [13] 谢耀霖:《复兴民族须先恢复自信力》,《复兴月刊》第1卷第8期,1933年4月1日。
- [14] 杨兴高:《恢复中国固有民族精神与吸收外来文化》,《新文化月刊》第6期,1937年6月25日。
- [15][22] 陈立夫:《中国文化建设论》,《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10月10日。
- [16][24] 明仲恂:《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与恢复民族自信力》,《诚化》第5期,1936年。
- [17] “拜铁女士”:《这样如何能够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开封实验教育》第1卷第5期,1934年。
- [18][44] 潘梓年:《目前文化工作的具体内容——高度发扬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翻译与评论》第4期,1939年3月1日。
- [19] 张君勱:《思想的自主权》,《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卷上,第152页;张君勱:《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之发展》,《明日之中国文化》“附录”,第158-159页。
- [20][33] 子固:《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独立评论》第105号,1934年6月17日。
- [21] 谢耀霖:《怎样复兴中华民族》,《复兴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2月1日。
- [23][35] 华生:《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复兴月刊》第2卷第9期,1934年5月1日。
- [25] 胡适:《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3号,1934年6月3日。
- [26] 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独立评论》第156号,1935年6月23日。
- [27] 曹汉奇:《如何能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南大周刊》第104期,1934年。
- [28] 胡礼殷:《固有文化与自信力》,《每周评论》第141期,1934年。
- [29] 《民族自信心的恢复》,上海《大公报》1936年12月13日“社论”。
- [30]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5号,1934年6月17日。
- [31] 周作人:《西洋也有臭虫》,《独立评论》第107号,1934年7月1日。
- [32] 吴其玉:《读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6号,1934年6月24日。
- [34] 寿生:《读“信心与反省”后》,《独立评论》第107号,1934年7月1日。
- [36] “闻”:《自信力》,《宪兵杂志》第3卷第3期“卷头语”,1935年。
- [38] 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7号,1934年7月1日。
- [39] 解炳如:《民族复兴与民族性的改造》,《复兴月刊》第2卷第12期,1934年8月1日。
- [40] 江问渔:《中国过去的文化与将来的教育》,《复兴月刊》第3卷第10期,1935年6月1日。
- [41] 赖希如:《中华民族性弱点之改造论》,《建国月刊》第13卷第5期,1935年11月10日。
- [42] 立为:《中国民族性的考察》,《远东杂志》第2卷第2期,1937年2月28日。
- [43] 萧一山:《中国华民族之特质及复兴之途径》,《经世战时特刊》第26期,1938年11月1日;第27期,1938年11月16日;第28期,1938年12月1日。

责任编辑:杨向艳